



建筑学术研究丛书
Architecture Academic Series

北魏平城辽金西京 城市建筑史纲

高璋 主编 段智钧 赵娜冬 著

天
下
大
同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建筑学术研究丛书
Architecture Academic Series

北魏平城辽金西京 城市建筑史纲

高璋 主编 段智钧 赵娜冬 著

天
下
大
同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下大同 北魏平城辽金西京城市建筑史纲/高璋主编;段智钧,赵娜冬著.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2

(建筑学术研究丛书)

ISBN 978-7-112-12966-9

I. ①天… II. ①高… ②段… ③赵… III. ①城市史:建筑史-中国-北魏
(439 ~ 534) ②城市史:建筑史-中国-辽金时代 IV. ①TU-09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6914号

责任编辑:孙 炼

责任设计:赵明霞

责任校对:陈晶晶 马 赛

建筑学术研究丛书

天下大同 北魏平城辽金西京城市建筑史纲

高 璋 主编

段智钧 赵娜冬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2 字数:300千字

2011年2月第一版 2011年2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38.00元

ISBN 978-7-112-12966-9

(20137)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序

大同，国务院首批公布的 24 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其独特的古都气质、文化遗产与历史贡献，为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辉煌书写了浓浓的一笔。

“大同为古云中地，自武灵开辟，捍御雄边”。文明迭出，煌史凸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在此开疆拓土，建功立业。汉高祖刘邦北击匈奴，与匈奴战于白登，巧谋解围，遂因“白登之战”而闻名遐迩；“元魏建都，创设宫阙；辽金复置陪都；民物日繁，规制愈广，屹然为全晋一重镇”。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充满激情与创造，其中最辉煌当属北魏平城。时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从公元 398 年由盛乐迁都平城，即今日大同。430 年灭北凉统一北方，至 494 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大同作为北魏首都及中国北方政治经济佛教文化中心近乎一百年。

公元 907 年契丹族建国称辽与北宋烽火交战；公元 1115 年女真人建国称金，并于 1125 年灭取辽国与南宋抗衡，直至 1234 年被蒙古元翦灭。这一段辽金与南北宋对峙时期，有学者称之为中国第二个“南北朝”时代。

上述两个“南北朝”时代，正是大同历史上最为鼎盛时期，所谓“一代京华，两朝陪都”，即北魏京都平城，辽金陪都西京。无论拓跋北魏，还是契丹辽国、女真金朝，虽然他们的身影都已经化作历史遥远的记忆，却都在大同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留下诸多美丽传说和巧夺天工的艺术创造，如云冈石窟、华严寺、善化寺、悬空寺……其中建筑艺术，花开别样，为中国古代建筑苑囿，增添了一抹浓重、艳丽、深沉、光熠的色彩。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及夫人林徽因数次携众来山西作古建筑调查，其中于 1933 年 9 月，在大同详实调查了云冈、华严寺、善化寺和应县木塔等，写下了颇具分量的大作《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

为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 110 周年，进一步深入研究大同古建筑，发掘北魏和辽金王朝沉淀在历史深处的建筑艺术价值，段智钧和赵娜冬二位青年学者撰写了《北魏平城辽金西京建筑史纲》（以下简称《史纲》）一书，令人欣喜而激赏。

《史纲》洋洋数十万言，分“北魏平城”与“辽金西京”上下篇章，其特点之一，即脉络清晰，文图并茂，堪称一部颇为难得的研究大同古建筑的学术专著。从北魏平城到辽金西京；从云冈石窟、平城佛塔到华严寺、善化寺；从平城宫城、郊坛、明堂到辽金宫殿、衙署、普通住宅；从建筑模式、构架类型到建筑用材，宏大比之以高山，细微不舍以丝缕，如同营造一座富有特色的建筑——是的，《史纲》，其本身就是一个宏美而严谨的建筑佳构。

《史纲》的另一个特点，是从建筑视角切入，却又不局限于建筑，而是拓展研究空间，“功夫在诗外”，系统梳理和分析了平城建筑与西京建筑艺术的历史条件与独特时代背景。既是大同古建筑断

代史，又是北魏和辽金的大同史。书中旁征博引地论述了当时北魏立国平城的地理环境因素，分析了拓跋鲜卑民族的个性特质与社会历史文化生态，如“北方地区环境变化与拓跋鲜卑内迁”，“平城地区农牧整合与拓跋鲜卑定都”。作者指出，“魏晋以来胡族得以驰骋中原，一方面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对抗有关，而更重要的则是由于胡汉民族交往融合密切，致使以上地区人文环境错综复杂，才促使一些貌似一般的事件却造成了不一般的效果”。

第三个特点是，作者客观而科学地对“以汉族所建立的王朝为主线的‘正统’史观”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并阐发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历代学者更多受到古代以来的大汉族主义的影响，即把中原汉族所建王朝看做唯一正统，而忽视了同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大量政权，因而在主要历史文献中，涉及‘南北朝’的有关内容往往变成了见‘南’不见‘北’的偏正结构。”或许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作者在大量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建筑艺术为证，翔实解读了北魏和辽金少数民族国家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在以大同等城市为代表的当时南北经济文化交界和游牧农耕文化融合的正常广阔的区域，呈现的往往是聚居于此的各民族居民在历史发展舞台上的大交流和大进步，我们即使因循一些常见的建筑反映论的观点，也同样可以明显感受到大同地区古代城市建筑痕迹和遗存无论在平面、结构、造型等方面所体现的多样化和创造性特征。”

二位青年俊彦方至而立之年，生于大同，长于平城，攻读于名校清华，以优异学绩深得导师同学青睐，学业繁忙之余，深研故乡历史，怀报桑梓之情，博引浩瀚古籍，跋涉孤山野寺，呕心沥血，写出了颇为壮观的这部大著，确实可喜可贺。作为家乡人，应为历史文化名城后继有人而自豪，也应当为古都的少年才俊脱颖而出而鼓呼！

“奋皇城古都之余烈，振大同崛起之长策”。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大同全市上下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提出的“转型发展，绿色崛起”主题和文化名城、旅游名都、生态名邑、经济强市“三名一强”奋斗目标，全面开展古城的修复与保护工作及一轴双城的建设，成效卓然，前景美好。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璀璨而现代气息浓郁、充满活力的新大同，正在走进人们的视野，引起大家的关注和向往。《史纲》一书，无疑是从古建筑角度对大同的一个很好的宣传与介绍。为此，我很高兴为之作序。

最后，权以拙诗一首为序文结尾：

塞上古都自辉煌，
更须椽笔画沧桑。
史鉴一册增万韵，
作者竟是少年郎。

高璋

中共大同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2010年12月于大同

前言

公元 398 年后，大同（时称平城）成为拓跋鲜卑所建立的北魏王朝都城近 100 年。五百四十年之后，即在公元 938 年，大同（时称云州）被石敬瑭割让给契丹（辽），而再次成为一座被北方游牧民族控制的中心城市，并于 1044 年成为陪都（西京大同府）。此后 200 余年，直至 13 世纪末期，大同一直是辽、金、元的陪都之地。

北魏、辽、金分别是以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鲜卑、契丹、女真为主所建立的不同王朝，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均占有重要地位，对开发建设北方地区、发展当地的社会经济，并为促进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均起到重大作用，而且先后在大同这座古都名城创造了辉煌的城市和建筑文化。尽管如此，我们展开本书的有关研究和写作，却是因为这些相关内容一直备受冷落。

在中国传统史学的断代史研究格局中，北朝史和辽金史均素以冷僻著称。同样，在中国建筑历史研究中，关于北魏、辽金城市建筑领域大部分情况下也处于一种冷清的状态。加上大同这座古老的城市今天地处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其相应历史时期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建筑研究在冷僻、冷清的基础上则更是少有建筑学者专门问津，这也就使得我们在研究过程中经常有垦荒之感。在研究过程中，尽管每每受到诸如相关史料匮乏等难题的困扰，但是，我们认为克服如下的歧见和误区则是首当其冲的。

其一，以汉族所建立王朝为主线的“正统”史观误区。

从我们此前对南北朝时期一些较发达地区城市建筑研究的情况来看，历代学者更多受到古代以来的大汉族主义的影响，即把中原汉族所建王朝看做唯一正统，而忽视了同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大量政权，因而在主要历史文献中，涉及“南北朝”的有关内容往往变成了见“南”不见“北”的偏正结构。

可喜的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关注研究“北朝”，毋庸置疑，学术视角的全面超越必然会带来学术的极大进步且成果颇丰。这样渐入佳境的学术背景也对我们关注北魏平城时期的城市建筑有所促动。

此前，我们在参与编写一部中国建筑史参考辅导教材之宋辽金部分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辽金建筑研究中存在类似的被正统忽略的问题。关于从唐五代以降至元朝统一中国之前的三百余年时间的中华大地，大多数情况下往往被由汉族建立的“宋”来代称，即所谓唐宋元明清一以贯之。然而，实际上在 11—13 世纪的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辽、西夏与北宋，以及后来的金、西夏与南宋等，它们实际上都是并存的中华民族政权，无论从各自政权存在时间、辖治规模、文化水平、文明程度等整体上来看也均可等量而观。此外，从宏观历史进程来看，宋辽金这几个并存王朝都是华夏文明中生机勃勃的成员，正是它们的同時存在才构成了那个时期雄阔的中华版图，也构成了当今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前身之一。

我们认为，所谓“唐宋”之“宋”，至少应有两层含义才称得上全面，一层是指五代末崛起并控制了当时黄河流域及以南地区的赵宋单一王朝，另一层则应是指横亘 10—13 世纪前后相继的多个中

华各民族政权。然而，目前至少在国内建筑学界所论之“宋代建筑”，似仍多以单一王朝为主要研究取向，试图涵盖当时的整个历史时期却又不免捉襟见肘。

同样可喜的是，近年来逐渐有国内建筑学者开始将辽金城市和建筑作为专门的研究指向。而且，统观宋辽金历史时期整体而非仅限于单一王朝的研究探讨亦获得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

其二，以重要都城或建筑个例来表征某一时代整体的“择要”研究方法误区。

长期以来，言汉唐以来之城市则必称长安、洛阳，而多不提其他，这种做法就是择当时的特型实例作时代城市建筑之符号。不仅如此，大多数情况下还将同时期中原核心地区以外的城市历史研究统统划入了边疆史、民族史、地方史等次一级的学科领域之内。即使类似大同这样的区域和时代重点城市，也统统被忽视了。这样的做法充其量是为“简史”或“要点史”，而与总体史无涉。

一种曾颇为盛行的说法，认为北魏、辽、金等是北方落后少数民族的割据政权，其统治破坏了中国北方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甚至造成了历史发展的大倒退。尽管在城市建筑方面这些少数民族王朝相当大面积地继承和发展了原属中原的文明，但仍然被排除在“主流”城市之外。但实际上可能恰恰相反，在以大同等城市为代表的当时南北经济文化交界和游牧农耕文化融合的非常广阔的区域，呈现的往往是聚居于此的各民族居民在历史发展舞台上的大交流和大进步。我们即使因循一些常见的建筑反映论的观点，也同样可以明显感受到大同地区古代城市建筑遗迹和遗存在平面、结构、造型等方面所体现的多样化和创造性特征。

另外，早在数十年前就已有不少学者接受了宋辽金时代是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南北朝”的观点。加上北魏经营平城所处的第一个南北朝时期，古都大同绝无仅有地完整经历了中国历史上这两次“南北朝”，并且均在其中占据了显赫地位。总体来看，大同这两次由中原汉族王朝统治之下进入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版图之中，均非征服战争所致，因此当时的城市均未受到大的破坏，南北文化也真正在此实现了和谐交流。

本书从断代城市建筑史纲的角度着手讨论，不仅秉承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先生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和《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所开创的学术体系和研究方法，始终坚持沿着以梁思成等中国营造学社前辈学者指明的学术方向，对相关建筑遗存、遗迹和记载按照一般的建筑史论述分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归纳和整理，而且依据第一手的历史文献、古建筑调查以及考古发掘材料，尝试在一些领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索，例如在上篇中推证北魏定都平城的背景、城市建设和主要宫殿建筑布局的可能状况，又如下篇中探讨辽金华严寺的寺院布局情况等内容，分别专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求真讨论，并且通过逻辑论证给出了自己的观点，虽不敢说有关见解多么确证无疑，但都是言之有据的。此外，书名既称之为“纲”，则是期待更多的仁人志士前来共同关注北魏平城和辽金西京城市建筑这个领域，唯盼“纲举目张”，以推动整体研究深入开展。

· 著者

2010年11月于清华园

目 录

序 前言

上篇 北魏平城

1 奋翼幽裔，翰飞京师——北魏定都平城的人文背景	3
1.1 北魏定都平城的环境条件	3
1.1.1 北方地区环境变化与拓跋鲜卑内迁	3
1.1.2 平城地区农牧整合与拓跋鲜卑定都	10
1.2 北魏定都平城的文化生态	13
2 衢文问鼎，路盈访玺——北魏平城的城市建设	17
2.1 平城城市建设与布局探微	17
2.1.1 平城的外城与郭城	17
2.1.2 平城的城门与城墙	24
2.2 平城遗迹所见建筑形象拾零	29
2.2.1 屋顶形式	29
2.2.2 建筑构件	32
2.2.3 建筑结构	38
3 化由礼治，政以宽成——北魏平城的宫室殿宇	43
3.1 宫殿建筑考证	43
3.1.1 宫城范围：考古证据与文献推理的结合	44
3.1.2 宫城遗迹：对大同操场城北魏一、二号遗址原有建筑的一些讨论	46
3.1.3 邺城模式：道武帝、明元帝时期的宫殿建设（398—423年）	52
3.1.4 大朝永安：太武帝、文成帝、献文帝时期的宫殿建设（425—458年）	58
3.1.5 太和新制：孝文帝时期的宫殿建设（477—492年）	62
附记之一：白台与白楼	67
附记之二：平城宫殿的东、西堂	67
附记之三：平城的儒学	68
3.2 郊坛明堂考论	69
3.2.1 郊坛	70
3.2.2 明堂	74
附记：平城的籍田	77
4 望仪神婉，即象心虚——北魏平城的佛教寺院	79
4.1 平城佛寺之钩沉	81
4.2 云冈石窟的兴建	82
4.3 平城佛塔之形象	85

下篇 辽金西京

5 辽金西京城市建设概览	93
5.1 辽	95
5.1.1 城池	95
5.1.2 官署建筑	95
5.1.3 学校建筑	96
5.1.4 宗教建筑	96
5.2 金	96
5.2.1 城市	97
5.2.2 宫殿	98
5.2.3 官署	98
5.2.4 宗庙	99
5.2.5 宗教建筑	99
5.2.6 普通住宅	100
6 辽金西京佛寺建筑英华	102
6.1 华严寺	103
6.1.1 关于寺院建造年代的讨论	104
6.1.2 关于寺院朝向的讨论	105
6.1.3 关于寺院布局形制的讨论	106
6.1.4 大雄宝殿	108
6.1.5 薄伽教藏殿	115
6.1.6 海会殿	125
6.2 善化寺	128
6.2.1 概况与沿革	128
6.2.2 大雄宝殿	131
6.2.3 普贤阁	137
6.2.4 三圣殿	143
6.2.5 山门	149
6.3 木构建筑实例的构造特点	153
6.3.1 用材	154
6.3.2 构架类型	154
6.3.3 铺作	155
6.4 相关建筑研究的深入	156
6.4.1 引言	157
6.4.2 关于营造用尺的推算	158
6.4.3 对用材的一些讨论	164
余论	164
图片索引	166
著者后记	171

上篇

北魏平城

北魏平城时期帝系

庙 号	谥 号	姓 名	年 号	时 间
北魏太祖（初谥烈祖）	道武皇帝（初谥宣武皇帝）	拓跋珪	登国	386—396 年
			皇始	396—398 年
			天兴	398—404 年
			天赐	404—409 年
北魏太宗	明元皇帝	拓跋嗣	永兴	409—413 年
			神瑞	414—416 年
			泰常	416—423 年
北魏世祖	太武皇帝	拓跋焘	始光	424—428 年
			神䴥	428—431 年
			延和	432—434 年
			太延	435—440 年
			太平真君	440—451 年
			正平	451—452 年
—	南安隐王	拓跋余	承平	452 年
北魏恭宗（北魏高宗追崇）	景穆皇帝	拓跋晃	—	—
北魏高宗	文成皇帝	拓跋浚	兴安	452—454 年
			兴光	454—455 年
			太安	455—459 年
			和平	460—465 年
北魏显祖	献文皇帝	拓跋弘	天安	466—467 年
			皇兴	467—471 年
北魏高祖	孝文皇帝	元宏（拓跋宏）	延兴	471—476 年
			承明	476 年
			太和	477—499 年

1

奋翼幽裔，翰飞京师 ——北魏定都平城的人文背景

公元398年，鲜卑族拓跋部（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时称“代”）从盛乐向南迁都到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长达近百年波澜壮阔的北魏平城时期由此展开，以其都城及其宫殿、寺院、园林等为代表的辉煌灿烂的北魏平城城市建筑及其文化被创制建造出来。而所有这些建筑活动不仅具有地域特点，而且又都是在中国魏晋南北朝以多民族的文化整合、多元化的思想建构为特点，伴随着大变乱、大冲撞、大交流的中华民族涤旧生新的历史背景下萌生并蓬勃开展的。在这里，我们主要从环境条件和文化生态两方面来对拓跋鲜卑定都平城及其展开城市建设的人文背景略加诠释。

1.1 北魏定都平城的环境条件

1.1.1 北方地区环境变化与拓跋鲜卑内迁

北魏自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在云中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即位建国，到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为止，共148年。从天兴元年（398年），“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①”，到太和十九年（495年），“九月庚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②”，北魏在平城（时亦称代京、北京）建都时间达97年，较其在盛乐的12年和洛阳的39年都长很多，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平城是北魏王朝历程中最重要的一座都城。

① 魏书·帝纪第二，太祖纪

② 魏书·帝纪第七下，高祖纪下

北魏都城平城所在的今山西省大同市区附近地区，位于黄土高原东北边缘，山西省北部大同盆地的中心地区，西部、北部环山，东有御河纵贯南北，中部、南部是由自西南向东北流经的桑干河（及其支流）冲积而成的平川，整个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一般地区平均海拔在千米以上。

按照谭其骧先生的分析，平城附近地区（以及黄河河套东北角附近地区）在战国以前还处于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时代，所以原始植被还未被大量破坏，直至秦汉移内地汉族居民戍边郡，局面才有所变化。由于这里的地形、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可农可牧，以务农为本的中原居民到此大量开展了农业生产，“先为室屋，具田器^③”。

③ 汉书·爰盎晁错传

历史时期一地区的植被情况如何，又主要决定于生活在这地区内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即土地利用的方式。如果人仍以狩猎为生，天然植被可以基本上不受影响。畜牧与农耕两种生产活动同样都会改变植被的原始情况，而改变的程度后者又远远超过前者。因为人们可以利用天然草原来从事畜牧，只要薄牧不过度，草原即可经久保持，而要从事农耕，那就非得先把原始森林和原始草原予以祈伐或清除不可^④。

④ 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02）：26

有关历史文献与已知考古发现对照显示，平城地区应不晚于汉代就曾有关郡建立城郭于此。“云中县。本汉平城县，属雁门郡。汉末大乱，其地遂空。魏武帝又立平城县，属新兴郡。晋改属雁门郡。后魏于此建都，属代尹，孝文帝改代尹为恒州，县属不改^⑤。”

⑤ 元和郡县图志·卷第十四，河东道三

● 一般认为北朝是从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起,到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渡江灭陈为止,首尾150年。而南朝从公元420年就已经开始。

● 竺可桢《考古学报》1972年第一期

● 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558

● 晋书·列传第六十七

● 晋书·列传第六十七·北狄匈奴

在西晋惠帝时期的八王之乱(291—306年)以后,晋室衰弱,由北方已相继进入中原的五胡趁机起兵,于是中原动荡。在百余年间由入主中原的五个主要部族,即匈奴、羯、鲜卑、氐、羌(史称五胡)及汉人在中国北方的大部以及东北、西南的局部,先后建立起约二十个分裂割据政权,其主要者,史称“十六国”。十六国中的前燕、后燕、西秦、南凉、南燕,以及未计入其中的代国(后建立北魏的拓跋鲜卑)等均为鲜卑族人所建。这个“五胡乱华”混战分裂的局面,直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延五年(439年)攻灭河西之北凉,一统黄河流域,才得以终结。自此南北朝并立(420—589年)^①,整体社会经济文化得以恢复发展,并最终再次走向了统一。

这一时期中国北方基本处于由塞外内迁的游牧民族统治之下,而且,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北部和周边游牧民族世居地气候急剧恶化的时期——魏晋以来东、北亚地区进入了一个气候寒冷期,干燥寒冷、霜期延长。20世纪70年代,竺可桢先生即通过相关史料的考证,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指出,我国秦至西汉时期基本上气候温和,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天气趋于寒冷,且变化较为急剧^②。多数有关学者认为,当时的平均气温比现在低2摄氏度左右,“气候的这一变化自然会引起人口分布的一系列变化。由于气温偏低,农业区的北界会向南收缩,牧业民族也会因此而南迁。”^③同时这一历史时期又是一个气候异常期,旱、涝、风、霜、蝗等自然灾害大面积频发,我国魏晋南北朝的气候异常期在4—5世纪之间达到了一个极端状况。在持续干旱、严寒的打击下,北方游牧民族因生态变化的压力而开始南下。

从总体来看,气候的显著变化会对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有极大的影响,而且,在历史长时段,气候和生态环境的变化很可能是一个引发民族迁徙并持久作用的重要因素。北方少数民族较大规模有组织的内徙中原,早在西汉末年就已经开始了,如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在匈奴夺位失败后归附汉朝,“汉嘉其意,割并州并界以安之。于是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其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④。东汉末至魏晋,不断有大量北方少数民族内迁归附中原的历史记载,“(曹)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⑤。北方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很多草原地区越来越不适于居住,南迁进入中原以避开寒冷的气候绝不是偶然现象。我们认为,尽管自然环境变化不一定是当时北方少数民族逐次向南内迁至中原的全部动力,但至少是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并对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同样,气候的变迁对中原农业社会的影响也很严重。有研究表明,北魏贾思勰所著农书《齐民要术》所记载的华北及周边地区一些物候时间可能要比现代黄河流域的推迟10—15天。像当时的西晋这样一个把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中原王朝,在气候的变化面前也同样脆弱,农业大面积欠收减产对北方农作物单产较低的地区(主要是华北地区北部与游牧民族接近地带)影响更大,天灾以外再加上连续内乱等人祸,造成了这些地区原有农业人口向外迁,某种程度上也为这些地区“退耕还牧”而接受游牧民族迁入提供了空间。东汉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在平定并州时所撰《苦寒行》诗描写道:“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羆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我们可以知道在当时的太行山地有大量的野兽出没,而居民却很稀少。

引发迁徙的因素除了气候等生态环境外,还有人文环境的影响。从八王之乱至永嘉之乱(311年)以来,一系列表面看起来带有偶然性的历史事件引发了社会极大的动荡和变迁,并波及了包括平城在内的黄河以北广大的中原王朝传统疆域。“八王之乱演而为永嘉之乱,永嘉之乱演而为‘五胡乱华’,其终极原因在于百余年来

各胡族社会的逐渐封建化、农业化和各胡族逐渐内徙，而东汉、魏、晋政权又无力阻止这一内徙的历史趋势。”^①一般认为，汉代对周边少数民族事务恩威并施，处置得当而效果较好。而魏晋以来，胡族得以驰骋中原，一方面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对抗有直接关联，而更重要的则是由于胡汉民族交往融合密切，致使以上地区人文社会环境错综复杂，才促使一些貌似一般的事件却造成了不一般的结果。

●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9

与此同时，政治军事动荡造成这一时期的黄河流域农业经济衰退，社会生产不能正常进行，人力资源和社会财富更多地用于战争等消耗，很多地方的农业经济功能逐渐衰退。在北方汉地人口锐减的情况下，西部和北部的周边各游牧少数民族便开始不断地向内地迁移，在魏晋时期达到高潮，朝廷对各少数民族往往采取和亲羁縻、利诱招抚等手段，在中原王朝的统辖下，他们或服役或从事农业生产，以弥补中原兵力和劳力的不足。我们推测，在拓跋鲜卑发祥地大鲜卑山地区，由于氏族人口逐渐膨胀或者气候变化等因素，拓跋鲜卑部民的繁衍很可能也受到了当地自然环境的制约。于是，他们便随着其他北方少数民族内迁的大潮历尽艰辛辗转几千里，向中原一路迁徙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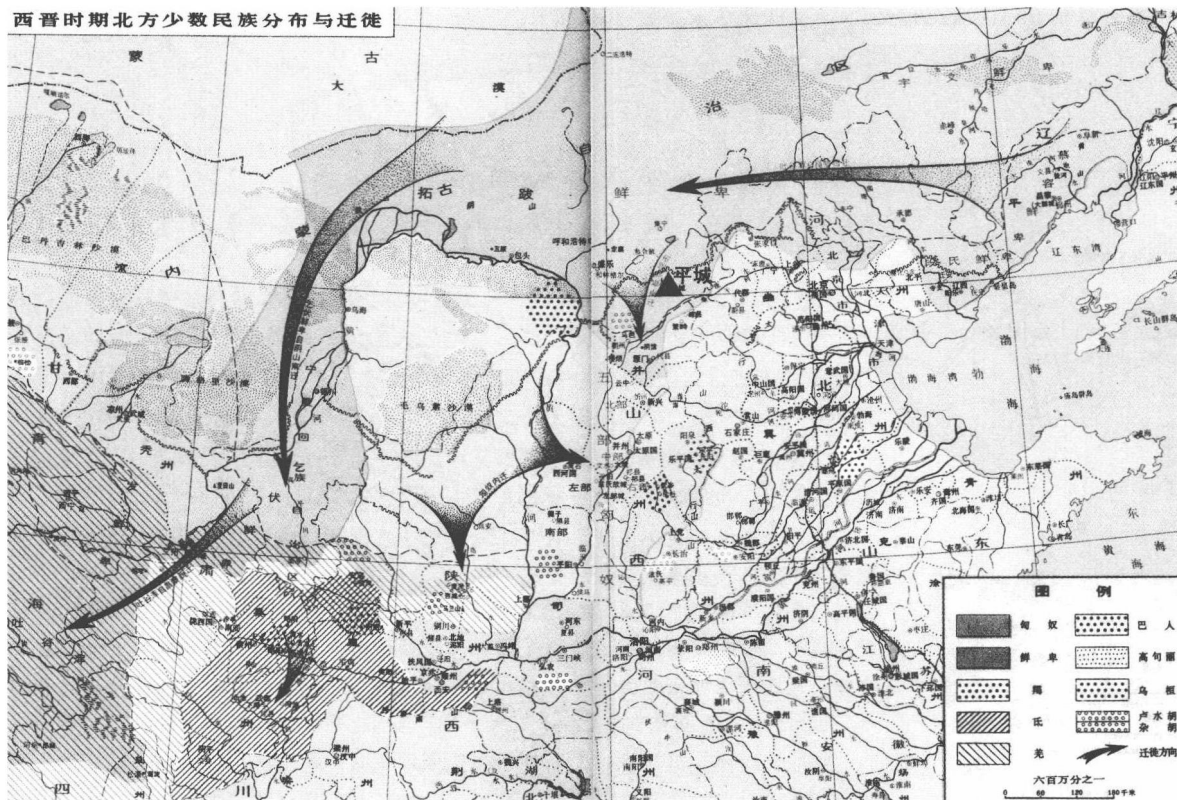


图 1-1-1 西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分布与迁移

鲜卑是我国古代属东胡系统的古老民族之一。据《魏书》、《北史》等正史的说法，鲜卑人的先祖为轩辕黄帝少子昌意，外封于幽都大鲜卑山，便以山为族号。鲜卑拓跋部（拓跋鲜卑）的拓跋姓氏来源于对土地的崇尚，“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以射猎畜牧为业，逐水草而居，勤劳淳朴。后曾辅佐尧舜。一般认为，汉代以前，拓跋鲜卑就聚居于在今南部嫩江流域大兴安岭北段附近（大鲜卑山），其发祥地位于附近茫茫林海中的一座石室之内，关于这座石室（嘎仙洞），还有一些相关史迹可考。其后裔便生活在这片白山黑水间的广阔天地之中，“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②。其后，拓跋鲜卑与其他鲜卑部落（以及东胡部落）混居。

● 魏书·帝纪第一，序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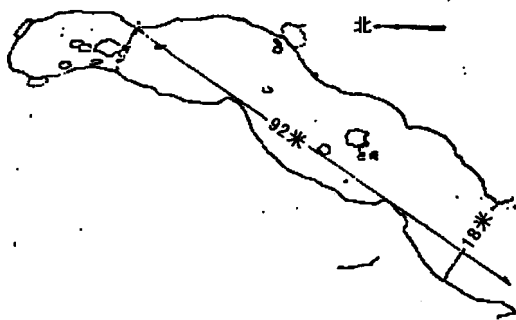


图 1-1-2 嘎仙洞平面图

● 魏书·志第十，礼四之一

“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①拓跋鲜卑南迁数百年后建立北魏，因相隔辽远，这座宗庙石室就逐渐湮没了。《魏书》记有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年间，北魏属国乌洛侯国使臣向北魏朝贡时称“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太武帝拓跋焘便派中书侍郎李敞带领祭祀队伍前往这座“国家先帝旧墟”告祭，并“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当时的祝文记载如下：

天子煮谨遣敬等用骏足、一元大武敢昭告于皇天之灵。自启辟之初，祐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聿来南迁。惟祖惟父，光宅中原。克剪凶丑，拓定四边。冲人纂业，德声弗彰。岂谓幽遐，稽首来王。具知旧庙，弗毁弗亡。悠悠之怀，希仰余光。王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祐。敢以丕功，配飨于天。子子孙孙，福禄永延。^②

● 魏书·志第十，礼四之一

● 米文凭：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81（02）：1

1980年，这个石室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旗西北十公里的山林中被考古人员发现，当地居民将这个天然石洞称为“嘎仙洞”。由此多数学者认为文献记载的鲜卑起源之地的大鲜卑山在此。另外，此地（北纬50°38′，东经123°36′）所居大兴安岭北段东麓，至平城（约北纬40°，东经113°）的实际距离也与《魏书》记载的“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余里”大致接近。在嘎仙洞内西侧石壁上也发现了一篇石刻祝文，主体内容如下：

维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廿五日\天子臣焘使谒者仆射库六官\中书侍郎李敞傅宽用骏足一元大武\柔毛之牲敢昭告于\皇天之神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聿来南迁应受多福\光宅中原惟祖惟父拓定四边庆流\后胤延及冲人阐扬玄风增构崇堂剋\揣凶醜威暨四荒幽人忘遐稽首来王始\闻旧墟爰在彼方悠悠之怀希仰余光王\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祐\归以谢施推以配天子子孙孙福禄永\延荐于\皇皇帝天\皇皇后土以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敦配\尚飨^③

● 米文凭：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81（02）：2

尽管这篇祝文与《魏书》所载祝文个别字句有一些出入，但内容大致相同。因此，近年来大部分学者认为太武帝拓跋焘派人祭祀的拓跋鲜卑发祥石室应就是此嘎仙洞，并且大鲜卑山应指大兴安岭可以得到明确。嘎仙洞附近的大兴安岭一带山林密，具备良好的狩猎生活条件，很可能就是拓跋鲜卑先世栖息活动之地。

我们认为此时拓跋鲜卑早期先民很可能是以天然山洞、石穴等为主的集体居住形式，这也与其当时“射猎为业”的原始生产生活方式有所对应。“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又禽兽异于中国者，野马、原羊、角端牛，以角为弓，俗谓之角端弓者。又有貂、豹、驪子，皮毛柔蜃，故天下以为名裘。”^④在东汉统治者的视野里，鲜卑民族还是一支距离中原辽远、依山林定居、以野外采集狩猎（也可能会牧养一些牲畜）为主业的民族。比照与中原联系较多的匈奴、乌桓等部族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⑤，

●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

● 汉书·匈奴传

由丛林山洞居住转徙而来的鲜卑可能更为落后一些，有关考古发现也表明当时鲜卑族的部分劳动工具很可能仍处于石器时代的水平。

在首领推寅时期，拓跋鲜卑“南迁大泽，方千余里”^①。不少学者认为，这个“大泽”之地位于大鲜卑山西南的嫩江下游，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呼伦湖附近草原地区。在呼伦湖以北的扎赉诺尔发掘出土的大约同时期鲜卑古墓群随葬物显示：“墓中以大量的牛、马、羊骨殉葬，显然这一部落的民族是以游牧为生。出土数量较多的簇、矛以及弓囊等武器，说明其善于骑射。”^②这表明当时于此聚居的鲜卑部落已经由射猎转向以游牧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逐水草而居。又因未有筑城活动，采取的很可能是类似于匈奴等草原民族的帐幕居住形式。

① 魏书·帝纪第一，序纪

② 内蒙古考古工作队，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61（12）：6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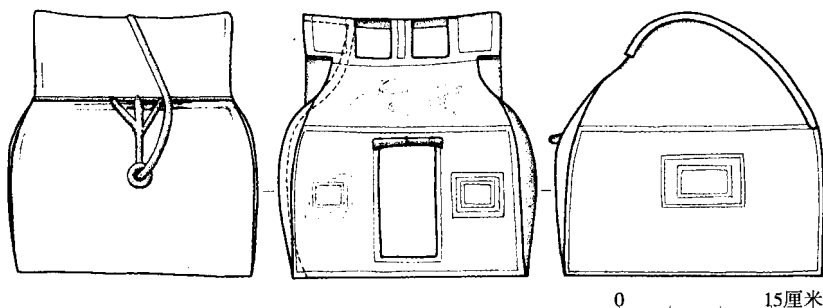


图 1-1-3 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 M2 出土陶方形帐房

我们注意到在《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提到的鲜卑部落时多用“邑落”、“邑”等称呼。如果此处之“邑”代表的是某种定居生活方式的话，那么，很可能在东汉的时候鲜卑已经有了一定的汉化，甚至吸收了一定的农耕生产方式。历经数代繁衍之后，由于此地周边东南方向遍布大面积的沼泽区域，聚居条件不佳，“厥土昏冥沮洳”；也不适宜筑城居住，“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③因此，拓跋鲜卑仍然谋求继续南迁。当北匈奴被东汉军队击败向中亚方向西迁以后，居于草原东南部的鲜卑拓跋部（拓跋鲜卑）也逐步向西、向南迁移，进入原来北匈奴驻地（毗邻东汉边缘地区），与未迁走的部分匈奴部众融合，并持续向南推进。《魏书》对这段早期历史的记载如下：“献帝（邻）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④这段文字对马、牛的强调，很可能也说明了刚刚走入草原的拓跋鲜卑对游牧生活的接受和适应，或者显示了蓄养马牛在拓跋鲜卑部族中的重要性，并增强了他们向更好牧场迁徙的决心。

③ 魏书·帝纪第一，序纪

④ 魏书·帝纪第一，序纪

圣武帝（诹汾）尝率数万骑田于山泽，歎见輶辇自天而下。既至，见美妇人，侍卫甚盛。帝异而问之，对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寝宿。旦，请还，曰：“明年周时，复会此处。”言终而别，去如风雨。及期，帝至先所田处，果复相见。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养视之。子孙相承，当世为帝王。”语訖而去。子即始祖也。故时人谚曰：“诹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⑤

⑤ 魏书·帝纪第一，序纪

这个将诹汾之子拓跋力微传说为“天女之子”的故事，一方面流露出拓跋鲜卑对天及自然神的崇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拓跋鲜卑已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部落联盟与其他鲜卑族群有所差异，而且有可能拓跋鲜卑已经跟周边逐渐增多的其他部族发生了较密切的联系。

陈寅恪先生认为鲜卑的种族关系非常复杂，“鲜卑一词包含胡人的种类正不知有多少”^⑥。对东汉时期拓跋鲜卑遗存 DNA 样本的分析发现，“就遗传距离、系统发育分析和多维度分析而言，拓跋鲜卑表现了和匈奴人群有较近的亲缘关系，但首

⑥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演讲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93

⑥ 于长春等. 拓跋鲜卑和匈奴之间亲缘关系的遗传学分析. 遗传, 2007 (10): 1228

⑦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

⑧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

⑨ 孙危. 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初步研究. 内蒙古文物考古, 2001 (01): 107

⑩ 魏书·帝纪第一, 序纪

⑪ 黄仁宇. 中国大历史. 北京: 三联出版社, 1997: 99

⑫ 魏书·帝纪第一, 序纪

⑬ 魏书·帝纪第一, 序纪

先与鄂伦春之间表现了最近的亲缘关系。这说明当时的拓跋鲜卑和匈奴之间是有一定的母系基因交流的。”^⑥

在据有阴山南北广大的地区——匈奴故地后, 至东汉末, 鲜卑诸部整合达到一个强盛的状态, “自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 皆为鲜卑庭。数犯塞寇边, 幽、并苦之。”^⑦鲜卑族人与周边聚居的北方各族居民共同生活劳作, 并且结成新的“化外”族群, 对朝廷叛服不常, 并经常向南抄略中原。按照《魏书》的记载, 拓跋力微继任拓跋鲜卑首领“岁在庚子”, 即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曹丕建曹魏篡汉, 这一年也是拓跋鲜卑有准确历史纪年的开始。后来又历经分裂衰落, “然后种落离散, 互相侵伐, 强者远遁, 弱者请服。由是边陲晏安, (汉)南少事, 虽时颇钞盗, 不能复相扇动矣。”^⑧

除历史文献记载外, 考古工作者根据近几十年来上述地区所发现的鲜卑墓葬的分期分区, 也可以将拓跋鲜卑迁都平城之前的迁徙路线基本加以明确, “拓跋鲜卑的迁徙路线应为: 嘎仙洞→拉布达林→扎赉诺尔→孟根楚鲁→南杨家营子→苏泗汰→三道湾→皮条沟→和林格尔, 时间大体为公元前1世纪末至公元3世纪中。”^⑨

迟至魏甘露三年(258年), 被北魏后代尊为“始祖神元皇帝”的拓跋力微携大批部众“控弦上马二十余万”, 从长川(今内蒙古五原附近)迁居至定襄之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附近, 平城西北方向)。举行祭天仪式, 随后在召集诸部君长的大会上, 拓跋力微向部属通告了放弃劫掠边地中原居民的决定, “我历观前世匈奴、蹋顿之徒, 苟贪财利, 抄掠边民, 虽有所得, 而其死伤不足相补, 更招寇讎, 百姓涂炭, 非长计也。”^⑩从此奠定了拓跋鲜卑与中原农耕居民和睦共处、交流融合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基调, 这样的态度以其“忍耐性”和“前后一贯”而为史家所称道^⑪。这时拓跋鲜卑可能还接受了汉族聚落筑城而居宫室的生活方式, 并开始由

部落联盟向建立国家过渡。拓跋鲜卑与当地胡汉居民交流贸易, 并与当时的魏王朝和亲, 后来又与西晋和睦相处, “自始祖以来, 与晋和好, 百姓义安, 财畜富实, 控弦骑士四十余万。”^⑫拓跋鲜卑作为中原王朝北方边境外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军事力量, 其影响力已向南扩展到了并州(今山西大部), “穆帝始出并州, 迁杂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⑬, 其周围的一个很大的区域成为拓跋鲜卑的势力范围, 继而为取得更有利的生存空间, 逐渐卷入了当时中原地区较为激烈的政治冲突当中。尽管拓跋鲜卑部落联盟后来又走向低谷, “诸部离叛”, 一分为三, 但实际仍控制了东起上谷北, 西至定襄盛乐的广大地区, 并毗邻魏晋的北方边境。



图 1-1-4 拓跋鲜卑内迁中原路线示意图